

19 世纪 30 年代埃及在叙利亚地区的统治研究

刘 渊* 王新刚**

内容提要 19 世纪初，埃及经过穆罕默德·阿里的西方化改革后成为奥斯曼帝国“唯一有生命力的部分”，面对日益衰落的奥斯曼宗主国，埃及基本上处于一个相对独立的状态并逐步走向对外扩张的道路。与此同时，穆罕默德·阿里的西式改革也伴随其扩张脚步延伸到了其他地区，对当地产生了非常大的震动，叙利亚地区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随着第一次土埃战争的结束与《屈塔希亚和约》的签订，埃及开始了对叙利亚的十年统治。在这十年间，叙利亚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人民思想受到启蒙，西方的政治文化和思想观念开始在叙利亚渗透。这十年的统治开创了叙利亚历史的新纪元，叙利亚社会开始向现代化迈进，一方面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也在埃及统治者开放的政策和大力倡导下逐渐在叙利亚萌芽。另一方面，埃及对叙利亚的入侵使得欧洲列强在这一区域的争夺斗争“愈演愈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 19 世纪后半期的欧洲政治局势。

关键词 埃及 叙利亚 穆罕默德·阿里 易卜拉欣 奥斯曼帝国

19 世纪初的埃及和叙利亚地区作为奥斯曼帝国的两个行省，属于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但随着奥斯曼帝国在“维也纳之战”（1683）后逐渐衰弱，一些偏远的行省相继摆脱了帝国控制，埃及在马木鲁克的统治下名义上臣服奥斯曼帝国，实则是独立的一部分。1805 年，穆罕默德·阿里控制了埃及局势，并进行了西方化改革，稳定了政治秩序，发展了社会经济，

* 刘渊，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 王新刚，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最为重要的是他在法国的帮助下组建了一支纪律严明、装备先进的新式军队。1831年,第一次土埃战争爆发,正是在这支新军的帮助下,埃及势如破竹,逼近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危在旦夕。然而在列强的干涉下,土埃双方缔结和约、结束战争,埃及在承认奥斯曼宗主国的前提下获得了对叙利亚的统治权,埃及在叙利亚的统治由此开始。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叙利亚”并非指代当今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20世纪40年代叙利亚共和国建立之前,“叙利亚”是一个“地区”称谓,指代南起西奈半岛,北达陶鲁斯山脉,西起地中海东岸,东至叙利亚沙漠的这一广阔区域,大致包括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等国家和地区。

一 19世纪30年代埃及在叙利亚地区统治的背景

(一) 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叙利亚

奥斯曼帝国在征服叙利亚后将其划分为三个行政区——大马士革、阿勒颇和特里波利,奥斯曼帝国称其为“桑贾克”(Sanjak),直接隶属叙利亚的奥斯曼帕夏管辖。但从叙利亚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来看,这些奥斯曼帝国的帕夏并没有完成任务,他们更迭频繁,导致叙利亚社会秩序一片混乱。据统计,从1517~1697年的180年,大马士革省的帕夏就更更换了133人。^①在土地制度上,奥斯曼帝国在叙利亚实行租税承包制,包税人往往是当地有势力的封建主,他们向土耳其帕夏缴纳国税,却向农民征收数倍的金额。叙利亚农民因此背负着极为沉重的赋税和劳役,许多人因不堪重负而逃亡,加之鼠疫、蝗虫、地震等自然灾害接连不断,致使当地人口急剧减少。据统计到18世纪末,叙利亚的人口总数下降到150多万,而耶路撒冷和贝鲁特则分别只有1.25万人和1.5万人。^②

相比农民悲惨的生活处境,叙利亚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也没有好太多。由于新航路的开辟,国际商业重心从地中海东部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取代阿拉伯人成为国际商业贸易的中介。这使得严重依

① 王新刚 《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商务印书馆,2003,第126页。

② (美) 菲利浦·希提 《阿拉伯通史》,马坚译,新世界出版社,2015,第665页。

赖中转贸易和过境贸易的叙利亚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工厂大批倒闭，商人纷纷破产，以至“在人口稀少的巴勒斯坦地区，政府只能依靠耶路撒冷圣地的朝拜而获得少量收入以维持政府的运转”。^①此外，欧洲列强乘奥斯曼帝国衰败之际，纷纷取得贸易特权，把叙利亚地区变成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令原本就发展迟缓的当地商业和手工业雪上加霜。

在这种政治动荡、经济衰退的形势下，阿拉伯人民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起义接连不断。叙利亚和黎巴嫩地区逐渐成为反土运动的中心，仅在 18 世纪，反对奥斯曼帝国的起义和运动就数以百计，这些农民起义和反抗运动令帝国腐朽的统治摇摇欲坠，使本已羸弱不堪的奥斯曼帝国雪上加霜。由此可见，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尤其是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叙利亚的农业生产十分不景气，商业和手工业一蹶不振，人口大量减少，社会秩序混乱不堪，人民起义接连不断。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埃及人发动了战争，把军队开进了叙利亚。

（二）19 世纪初的埃及

18 世纪后期的埃及名义上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实则在马木鲁克势力的统治下俨然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然而处在马木鲁克统治下的埃及并不安宁，各个派系争权夺利、相互倾轧，与帝国政府的冲突频发，整个埃及社会动荡不安、兵连祸结。正是在这种状态下，1798 年 5 月，拿破仑打着“从马木鲁克暴政下解放埃及人”的旗号，侵入埃及。

法国对埃及的侵略和占领虽历时短暂，但对埃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给埃及带来了西方的现代化思想，促使埃及改革立法、教育和赋税制度，埃及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法国人的入侵瓦解了马木鲁克势力，为穆罕默德·阿里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奠定了基础。拿破仑在埃及与马木鲁克军队进行了大小数百场战役，极大削弱了马木鲁克的军事力量。马木鲁克军队落后的武器装备、涣散的军队纪律、传统的作战模式在拥有坚船利炮和久经沙场的法军面前不堪一击。仅在 1798 年 7 月 21 日的因巴贝战役中，马木鲁克军队就损失了 5000 骑兵和近万名步兵，实力遭到了

^①（美）菲利普·希提《阿拉伯通史》，第 665 页。

极大的削弱。^①

除此之外，马木鲁克在埃及的经济基础也被法国人大大动摇。在拿破仑占领埃及后，随即宣布没收马木鲁克所有的土地和财产，他们的妻儿想要留在埃及必须缴纳巨额赋税。没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失去了强有力的军队保障，马木鲁克势力在埃及再无立足之地。直至1811年，穆罕默德·阿里设计将马木鲁克势力在开罗一网打尽，在埃及断断续续存在近六百年的马木鲁克势力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随之而来的便是穆罕默德·阿里王朝。

穆罕默德·阿里是个雄心勃勃的人，在夺取埃及政权后，他表面上向苏丹称臣纳贡，内心却做着“帝国梦”，即建立一个以埃及为中心的阿拉伯大帝国，以取代日益衰落的奥斯曼土耳其。正因为有着这样一个宏伟的目标，穆罕默德·阿里从未想过要安于埃及一隅，而不断发动对外战争，埃军所到之处穆罕默德·阿里进行的西方化改革也随之而来，叙利亚地区正是其中之一。

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进行的改革是一场全面深刻的西方化变革，之所以称其为西方化的，主要是因为它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特别是法国的影响。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使法国成为近代史上第一个进占埃及的西方国家，从此法国与埃及始终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法国也将埃及视为与英国争夺东地中海霸权的同盟。因而法国在穆罕默德·阿里执政初期给予了埃及很大的人力财力支持，特别是派遣了一大批优秀的军官前往埃及帮助建立新式军队。所以说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从很多方面都可以找到法国的影子，这使得其从一开始就不同于以往的改良运动，而是一次崭新的、带有浓厚西方色彩的社会变革。

之所以称其为全面深刻的，是因为纵观穆罕默德·阿里改革的内容，涉及埃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军事、文教面面俱到。简单来说，政治上，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备的行政体系，实现了中央集权统治；经济上实行政府专卖政策，全面控制埃及农业生产和国内外贸易；军事上建立和培养新式军队，废除雇佣制改用募兵制，在全国各地创办军事学校，培养军事人才；文教方面大力发展世俗教育，效仿欧洲教育模式

^① 杨灏城 《埃及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24页。

建立世俗教育体制。此外，值得一提的是，1828 年穆罕默德·阿里创立的《埃及时报》使埃及成为第一个拥有现代意义报纸的阿拉伯国家。

经过改革，埃及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长期停滞的工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农村劳动力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社会形态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① 特别是在法国的帮助下埃及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战斗力十足的西式军队，鼎盛时期，它的人数超过了 10 万人。正是因为有了这支军队，穆罕默德·阿里才有了与奥斯曼帝国争雄的底气，才能在第一次土埃战争中轻松击败土耳其宗主国，取得对叙利亚地区的统治权。

（三）“东方问题”与第一次土埃战争

1. “东方问题”与希腊独立战争

“东方问题”是指近代欧洲列强为了争夺日益衰落的奥斯曼帝国及其属地的领土和权益所引发的一系列国际争端。广义上讲它包括从 19 世纪初到 1923 年土耳其最终独立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主要的参与国是英、法、俄、奥和统一后的德国；而狭义上的“东方问题”则特指 19 世纪 20 ~ 40 年代英、法、俄三国在奥斯曼帝国及其属地的角逐，而主要的历史事件就是希腊独立战争和两次土埃战争。^②

其中，希腊独立战争（1821 ~ 1829）是 19 世纪初欧洲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使得英国、法国、俄国、埃及和奥斯曼帝国先后卷入战火，对各国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是第一次土埃战争的导火索。希腊作为奥斯曼帝国的重要属地，其独立要求使列强纷纷看到了染指奥斯曼帝国事务的机会。战争爆发后，国际局势随即发生剧烈变化，苏联、英国、法国、美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最终达成《伦敦协定》，宣布奥斯曼帝国应承认希腊独立，给予希腊自治权。奥斯曼帝国对列强的态度并未理睬，联合穆罕默德·阿里将军队开进希腊。战争的结果毫无悬念，英国在决定性的纳瓦里诺海战中将土埃舰队全部歼灭，奥斯曼帝国被迫承认希腊独立。希腊战争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战争结束后，奥斯曼帝国进一步衰落，各属地的人民纷纷效仿希腊提出独立要求，全国局势一片混乱。同时，战

① 彭树智《中东史》，人民出版社，2010，第 208 页。

② 彭树智《中东史》，第 177 页。

争大量消耗了埃及的人力物力,在希腊战争期间,埃及先后派遣了4万多名陆海军赴希腊作战,结果,舰队几乎全部被歼,3万多名士兵丧命,耗费金钱高达77.5万镑。^①穆罕默德·阿里在愤怒之余开始追究奥斯曼帝国苏丹许给“战后授予埃及对叙利亚统治权”的承诺,但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并未予以兑现,这给了埃及人入侵叙利亚的口实。终于,在希腊战争结束两年后,第一次土埃战争爆发。

2. 埃及入侵叙利亚的原因

埃及入侵叙利亚实际上与早前侵入阿拉伯半岛镇压瓦哈比运动、远征苏丹以及干涉希腊独立运动性质是一样的,它们一同构成了穆罕默德·阿里对外扩张的一部分。前文曾述穆罕默德·阿里其志不在小,他对内实行强有力的西方化改革,对外加强外交联络,与法国等国建立良好的关系,最终目的就是要通过战争来实现他的“阿拉伯帝国梦”,这是他北上侵入叙利亚地区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穆罕默德·阿里对叙利亚地区觊觎已久。首先,叙利亚作为奥斯曼帝国较为富饶的行省,盛产小麦、橄榄油、水果和木材,也是埃及商品的主要销售市场,占领叙利亚,能给埃及带来巨额财富。其次,叙利亚众多的人口也让穆罕默德·阿里垂涎不已。埃及匮乏的人力资源让他为寻求兵源伤透了脑筋,他于1820年远征苏丹的主要意图就是掠夺当地的黑奴充军,可惜很多黑奴到达埃及后因不适应当地气候而大量死亡。因此,叙利亚庞大的人口可以很好地弥补埃及劳动力的短缺。再者,穆罕默德·阿里出于安全考虑,如果征服了叙利亚,叙利亚即可成为埃及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缓冲地带,一旦发生战争,埃及就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战争部署,能更有效地抵御来自宗主国的威胁。最后,征服了叙利亚便可以将伊斯兰教圣城耶路撒冷置于自己的统辖,这可以使穆罕默德·阿里以圣城保护者的身份自居,提高他在广大穆斯林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②

1831年初,巴格达总督放弃了对阿拉伯半岛北部的控制,贝都因部落开始在这一地区逐渐壮大。他们占领加沙地带,频繁地通过巴勒斯坦进入西奈半岛。^③还沿着埃及与巴勒斯坦边界,向阿拉伯半岛西部扩张,严重威

① 杨灏城《埃及近代史》,第92页。

② Antonius George, *The Arab Awakening*, New York, 1946, p. 21.

③ 顾琦斌《穆罕默德·阿里时期埃及对外扩张的探析》,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胁着叙利亚到希贾兹地区的陆上安全和红海贸易的顺利开展，而红海区域正是埃及对外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因此，阿拉伯半岛北部特别是叙利亚地区的贝都因部落成为埃及必须尽快清除的目标。

综合以上因素，叙利亚地区成为穆罕默德·阿里凯觐的首要对象。奥斯曼帝国军队在希腊战争中的不堪一击和他通过改革建立的新军在战争初期的英勇表现让穆罕默德·阿里信心大增，他已做好了随时对宗主国发动战争的准备。

3. 第一次土埃战争与《屈塔希亚和约》

1831 年 10 月，6000 名埃及农民为躲避劳役和税收逃亡叙利亚，叙利亚总督拒绝将其遣返。穆罕默德·阿里终于等到了机会，派其长子易卜拉欣率 3 万名士兵水陆并进，入侵叙利亚，第一次土埃战争爆发。

战争开始后，奥斯曼帝国军队没能在短时间内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叙利亚地区的居民也对土耳其人的长期压迫心生不满，向埃军大开方便之门。作为穆罕默德·阿里的长子，埃军统帅易卜拉欣天资聪慧，能征善战，加之黎巴嫩总督伯尔什二世（Boshir II）的大力协助，埃军势如破竹，迅速攻占了阿里什、加沙和雅法。1832 年 5 月，随着阿卡城的沦陷，埃军占领了叙利亚大部分地区。随后，埃及军队翻过陶鲁斯山脉进入奥斯曼帝国腹地安纳托利亚，双方在今土耳其南部城市科尼亚附近展开决战，以易卜拉欣的大胜而告终，埃军的 3 万人歼灭了奥斯曼帝国 6 万人的精锐部队。^① 易卜拉欣距离伊斯坦布尔只剩下三天的路程，奥斯曼帝国苏丹急忙向欧洲列强求援，而列强出于对各自利益的考虑，反应都有所不同。

如前所述，法国与埃及保持着特殊关系，在埃及，法国在诸方面相较于其他国家都获得了更多的特权。因此，法国不反对埃及入侵叙利亚，但同时，它又不愿看到奥斯曼帝国就此覆灭，使俄国渔翁得利。英国对东地中海地区始终抱有极大的兴趣，它总体的战略规划是维持奥斯曼帝国现状，使欧洲均势不被破坏。出于这一考虑，英国对埃及在叙利亚地区的不断扩张持反对态度，但由于此时爆发了比利时人民要求脱离荷兰殖民统治的战争，英国忙于处理欧洲事务，对奥斯曼帝国的请求未予理睬。不同于英法，

^① Asad Jibrail Rustum, *Syria under Mehemet Ali*,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t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Oct. 1924.

俄国在收到奥斯曼帝国的请求后，毫不犹豫地同意对其进行援助。俄国不愿看到一个强大的埃及取代软弱无力的奥斯曼土耳其成为它的西南邻国，这样它的百年海洋梦将永远无法实现。

因此，俄国派出5000人的先头部队进驻伊斯坦布尔，并于1833年初先后派遣了三支舰队开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并在两岸登陆。俄国的行为使英法两国惊慌失措，它们开始向埃及施加压力，敦促其停止推进并与奥斯曼帝国缔结和约。在列强的压力之下，穆罕默德·阿里最终接受了英法两国的建议，同奥斯曼帝国于1833年4月8日缔结了《屈塔希亚和约》(*Treaty of Kutahia*)，根据这一条约，叙利亚被划归埃及统治，他的长子易卜拉欣被任命为叙利亚、阿卡、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总督，并且获得了在吉达(Jidda)和奇里乞亚(Cilicia)征税的权力，埃及则从奥斯曼帝国其他地区撤军，继续承认苏丹的宗主权。^①自此，埃及在叙利亚地区的统治正式开始。

二 19世纪30年代埃及对叙利亚地区的占领和统治

埃及占领叙利亚之后，穆罕默德·阿里派他的长子易卜拉欣代其进行统治，如前所述，易卜拉欣是位精明强干之人，16岁时就被穆罕默德·阿里任命为开罗的管理者，21岁就带着军队驰骋阿拉伯半岛，有文韬又有武略。^②他与父亲一样，有着开放的思想务实的精神，早年在埃及议会担任议长的经历以及在阿拉比亚、苏丹和希腊的战争历练使易卜拉欣成长为一名沉着冷静、能胜大任的治国之才。他在统治叙利亚期间，将其父在埃及进行的西方化改革推行到叙利亚，并对叙利亚的政治结构和经济模式进行了大幅度调整。经过埃及近十年的统治，叙利亚建立起政府的常规系统，实施了对外开放的政策，拥有了安定的社会秩序，整个叙利亚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一位著名的叙利亚诗人曾说，这几年“堪称这个国家现代时期的开始”。^③然而，易卜拉欣在叙利亚地区推行的强制性征兵政策引起了叙利亚人民的不满，在其统治后期，叙利亚各地区的人民纷纷起来反抗

① Andrew McGregor,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from the Ottoman Conquest to the Ramadan War*,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6, p. 127.

② M. W. Dal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25.

③ (美)西·内·费希尔《中东史》，姚梓良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364页。

埃及的统治，加之第二次土埃战争的爆发和列强的染指，埃及最终于 1841 年撤出叙利亚，结束了对叙利亚地区的占领和统治。

（一）埃及在叙利亚地区的统治措施

1. 埃及在叙利亚统治的政治措施

在埃及统治叙利亚之前，叙利亚的政治体系一片混乱，政府没有像样的官僚机构，官员没有明确的职权划分，奥斯曼帝国委派下来的帕夏只负责完成税收任务，不为民办事。1832 年，易卜拉欣任命穆罕默德·谢里夫为大马士革最高统帅，负责叙利亚地区的行政事务。^① 谢里夫帕夏在中央建立起一套被称为迪万（Diwan）的官僚体系，它由一大批来自埃及和叙利亚的专家学者、秘书和翻译官构成，他们为谢里夫帕夏出谋划策，共同参与国家治理。

迪万体系由若干个迪万部门（Diwan Mashwara）构成，它们分别处理国家的税收、财政、交通和商业债务等问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在人口超过两万的城市还设立有人民议会，议员由农民、商人、知识分子等不同的社会群体组成以代表不同的阶层利益。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谢里夫帕夏规定在这些人当中至少要包含一名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可见在埃及统治叙利亚期间整体的宗教氛围是相当宽松的。

在地方上，易卜拉欣将叙利亚划分为四个省（mudiriya），即阿勒颇、大马士革、特黎波里和西顿，每个省的长官被称为省长，他们大多是从易卜拉欣的亲信中挑选而出，对大马士革的谢里夫帕夏负责。每个省又被划分为若干个县（mutasalimiyat），由县长进行管理，县长大多情况下由当地有名望的穆斯林担任，充当地方法官的角色，接受人民的监督。每个县又被进一步划分为若干个区（muqatat），由当地的族长或宗教领袖担任区长，这一职位是世代继承的，因此他们成为叙利亚最基层的管理者。^② 埃及由此在叙利亚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结束了叙利亚数个世纪以来分散、无序的地方分权体制。

在法律制度方面，易卜拉欣废除了原有的宗教沙里亚法庭的绝对权威，

^① Pierre Crabitès, *Ibrahim of Egypt—With Two Portraits*, George Routledge, 1935, p. 161.

^② Yvette Talhamy, “The Nusayri and Druze Minorities in Syri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Revolt against the Egyptian Occupation as a Case Study,” i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2012.

设置了一个与之相制衡的司法部门——议会法庭(The Majlis Shora)。议会法庭是前述人民议会的下属机构,它被赋予了与沙里亚法庭一同审理案件的权力。而在具体分工上,前者主要负责审理政治、经济案件,如商业纠纷、税收债务等问题,而后者则被局限于一些私人事务及宗教问题,权力由此被大大削弱。议会法庭对人民议会负责,薪金来源中央政府,由此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议会法庭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公正性。

易卜拉欣跟他的父亲一样,倡导阿拉伯民族身份认同,他始终认为所有的阿拉伯人应不分区域不分教派团结起来,建立一个庞大的阿拉伯帝国。基于这样的观念,易卜拉欣怀着了一颗平等之心去对待在叙利亚社会占少数的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当然他这样做也可能是为了讨好欧洲基督教国家,以获得它们的支持。易卜拉欣在进入叙利亚之初就颁布了减免宗教赋税的法令,他将异教徒需缴纳的诸多税种合为一体,废除地方政府向基督徒征收的保护费和财产补偿税,停止征收教堂的土地使用税和建设费;禁止向朝圣者和旅行者征收任何形式的过路费;圣墓大教堂取消门票免费向大众开放。^①在社会生活方面,易卜拉欣规定,叙利亚人民不分宗教归属一律有平等的机会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所有的行业在招收员工时不得有宗教歧视;他允许异教徒头裹白巾,身着颜色艳丽的服饰,并允许修缮基督教堂、犹太会堂以及神殿。他的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当时的社会宗教制度和伦理纲常,因此受到了当地穆斯林的嫉恨。由于基督徒和犹太教徒还可以免除兵役,以至当地的穆斯林认为在埃及统治叙利亚期间,基督徒所享有的社会权利甚至超过了穆斯林。^②

如同开放的宗教政策一样,易卜拉欣在外交方面也保持着较为开放的态度,欧洲人被允许自由出入大马士革。“在1831年,英国领事骑马进入大马士革城的时候,还必须由卫兵严密地保护着,而如今他们已经可以不用卫队跟从而随意进行游览了。”^③他们还被允许在叙利亚境内定居和从事商业活动,同时欧洲各国的领事馆被易卜拉欣赋予了“领事裁判权”和

① Pierre Crabitès, *Ibrahim of Egypt—With Two Portraits*, p. 162.

② Haddad Yazbeck, *The Administrative and Economic Policies of Ibrahim Pasha in Palestine, 1831 - 1840*,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73, p. 41.

③ Asad Jibrail Rustum, *Syria under Mehemet Ali*,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t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Oct. 1924.

“豁免权”，他们可以对本国居民进行保护和审查。因此，从 1832 年以后，来叙利亚旅行和传教的欧洲人大幅增加，叙利亚各地都有西方传教士所建立的学校、教堂和托儿所，大马士革一时宛若一座欧洲城市。易卜拉欣的这些举措极大地促进了叙利亚的西方化，对近代叙利亚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叙利亚人民开始逐渐了解西方的生产生活方式，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文化。

2. 埃及在叙利亚统治的经济措施

如前所述，埃及入侵叙利亚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经济因素，叙利亚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富饶的物产对埃及充满了吸引力。因此，易卜拉欣对叙利亚的土地和经济问题十分关注，在阿卡城尚未被攻陷之前，他就已经与同幕僚们商讨未来对叙利亚的经济政策。在此之前，奥斯曼帝国在叙利亚地区分封了大量的伊克塔（Iqta），这些分封地都是优质肥沃的良田，占到了叙利亚可耕地面积的 1/3。起初易卜拉欣允许伊克塔领主在获得许可的前提下继续享有领地，但他们的收入被削减为原先的 1/10。^① 后来易卜拉欣逐渐将其全部收归国有，同时，从 1833 年起他开始向叙利亚的瓦克夫（Waqf）土地发起挑战，他要求他们必须在规定期限内拿出土地的相关证明，否则将予以没收。通过对伊克塔土地和宗教地产的盘查清算，易卜拉欣直接控制了叙利亚绝大多数的土地资源。

为了提高粮食产量，拓宽人民的生存空间，易卜拉欣在叙利亚境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垦荒运动，垦荒的重点区域是太巴列湖周边（Tiberias）和叙利亚东南部地区（Leja Area）。^② 为了鼓励人民积极加入到垦荒队伍中来，易卜拉欣规定新垦殖的土地在三年内免除赋税。一时间叙利亚出现了垦荒热，在埃及统治的前两年，太巴列湖地区的可耕地从 2000 费丹增加至 7000 费丹，在阿勒颇周边地区，从 1832 年到 1834 年也新增了 85 个村镇和种植园。^③ 与此同时，大量的埃及农业专家奉命来到叙利亚教授农民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并带来了一批新的农作物品种，棉花、甘蔗、油橄榄等开始在

① Haddad Yazbeck, *The Administrative and Economic Policies of Ibrahim Pasha in Palestine, 1831 - 1840*, p. 48.

② Haddad Yazbeck, *The Administrative and Economic Policies of Ibrahim Pasha in Palestine, 1831 - 1840*, p. 49.

③ M. W. Dal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29.

叙利亚大面积种植。此外，易卜拉欣还完善了叙利亚的农业灌溉系统，疏通水渠、修建河道，把太巴列湖的水资源引入农田，解决了附近新垦土地的灌溉问题。经过这一系列举措，叙利亚的农业生产得到了重大发展，耕地面积得以增加，农产品种类日益丰富，农业生产技术得到改良，灌溉体系趋于完善，叙利亚人民的生活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虽然易卜拉欣关注的重点是叙利亚农业，但在工业和商业方面他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鼓励人民开办工厂，对新办的工厂给予土地费用和税收额度的优惠，以减轻叙利亚对西方工业产品的依赖。在埃及统治叙利亚期间，叙利亚境内的工厂数量翻了一倍，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位于耶路撒冷的毡帽厂和位于阿卡的军服厂，他们都是基础的军事物资供应单位，可见在这一时期的叙利亚工业是服务于军事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军工厂所生产的军服并非叙利亚传统的长袍和宽裤，而是西式的紧身衣服和夹克，由此可见埃及统治者的思想是相当开化的。同时，叙利亚的商业和地方贸易在埃及统治初期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一方面得益于这一时期稳定的国内环境；另一方面则是易卜拉欣采取了保护性的贸易政策，他对从欧洲进口而来的商品课以重税，并废除了之前奥斯曼帝国给予西方国家的所有商业贸易特权。他的这些举措使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一蹶不振的叙利亚商业贸易重新焕发了生机。

另外，在谈及叙利亚经济问题时，不得不提及叙利亚南部和巴勒斯坦地区的贝都因人，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以氏族为基本单位，在沙漠和山区过着游牧一半游牧生活。贝都因人凭借强大的部落组织和军事力量往往对中央政权构成很大威胁。^①但是他们却是叙利亚经济生产和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经济单位，他们饲养骆驼、牛、山羊，为城镇人民供应肉制品、皮革、羊毛。此外，由于骆驼是当时巴勒斯坦地区唯一的交通工具，因而贝都因人成了地方贸易的中介，在当地拥有独特的社会地位。易卜拉欣为了减轻他们对政权的威胁，鼓励贝都因人定居，免费发放给他们土地、种子、牲畜，并免除他们三年的赋税。但贝都因人对此并不买账，他们习惯了自由不羁的生活，并因穆罕默德·阿里曾打击过贝都因部落而对易卜拉欣领导的埃及政权充满敌意，贝都因人和黎巴嫩山区的封建割据势力成为

^① 黄民兴 《中东历史与现状十八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第68页。

易卜拉欣统治埃及期间最为棘手的问题。

3. 埃及在叙利亚的军事政策和人民的反抗

不同于易卜拉欣成功的、富于远见的政治经济政策，他在叙利亚实行的一些军事举措遭到了当地人民的厌恶和抵制，引发了人民的反抗斗争。如前文分析，埃及侵占叙利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看中了叙利亚的人口资源，叙利亚的青壮年特别是巴勒斯坦地区英勇善战的游牧一半游牧民对穆罕默德·阿里充满了吸引力。

1832 年，易卜拉欣刚踏入叙利亚的土地之时，穆罕默德·阿里就要求其在叙利亚境内进行征兵，但遭到了黎巴嫩埃米尔伯什尔·谢哈卜的极力反对，他劝说易卜拉欣在征兵之前首先要获得当地居民的信任和支持，而如今埃及尚未在叙利亚站稳脚跟，征兵可能引起大规模骚乱。^① 易卜拉欣接受了伯什尔的建议，暂停了征兵活动。但在国际形势不断变化和穆罕默德·阿里的一再坚持下，易卜拉欣最终于 1834 年 5 月开始在耶路撒冷、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展开大规模征兵。据伊维特·塔哈姆记述 “易卜拉欣于 1834 年 5 月会见了耶路撒冷的显贵，要求他们分别从纳布卢斯、耶城周边及希伯伦地区征募 2000、1500 和 500 名青壮年。”^② 这标志着埃及在叙利亚大规模征兵的开始，征兵运动很快就从耶路撒冷扩散到叙利亚全境。

但叙利亚不同于埃及，埃及人民习惯了服从命令和逆来顺受，他们认为服兵役是理所应当的事，而叙利亚人民却不这样认为。在历史上，叙利亚特别是巴勒斯坦地区的人民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长期处于半自治状态，地方许多封建霸主割据一方，根深蒂固。当他们听到埃及统治者要进行征兵时，感到非常惊讶和恐慌，在他们的意识里被征入军队就意味着要被派往埃及、苏丹或北部边境，有去而无回。因此，整个征兵过程在叙利亚遭到了强烈抵制，“征兵也因此很快演变为人口掳掠，村庄和城镇被军队包围，各个城镇上所有的重要通道都被哨兵把守，年轻的、强壮的人口全部被押送到埃及，训练成士兵……最终，人们被迫采用极端的方式来逃避征

^① Yvette Talhamy, “The Nusayri and Druze Minorities in Syri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Revolt against the Egyptian Occupation as a Case Study,” i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Nov. 2012.

^② Asad Jibrail Rustum, “Syria under Mehemet Ali,”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t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Oct. 1924.

兵,年轻人自断手臂、自毁双眼的事情频频发生”。^① 据估计,从1834年到1837年,埃及从叙利亚共征募了约7.7万人,在征兵达到顶峰时,叙利亚人口的4%都在充军,占劳动力的12%,超过了当时欧洲各国的普遍比例。^② 强制征兵在给叙利亚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给叙利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大量人口被征入军队,叙利亚大批农田荒废,人们因害怕征兵而四处逃亡,加之霍乱和瘟疫盛行,导致在埃及统治后期叙利亚地区的人口不断减少。

人民在征兵过程中的抵制和反抗催生了埃及统治者一项新的军事政策:解除人民武装。1837年,易卜拉欣要求叙利亚人民限期缴纳个人所有武器装备,一旦发现隐匿者将予以处死。起初这项法令仅局限于枪支火药,后来刀剑利刃等冷兵器也被列入其中。这在叙利亚人、特别是巴勒斯坦居民看来是带有侮辱性的。长期以来他们已经习惯携带武器枪支,他们认为这对自身安全是必不可少的,武器作为一种生活工具,被用来狩猎动物,交出武器对他们来说等于失去了生活来源。另一方面,武器被叙利亚人视作力量、地位和自由的象征,因此埃及人的这项法令一经颁布就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强烈不满。除此之外,在埃及统治叙利亚后期,由于国际局势趋于紧张,易卜拉欣开始在叙利亚全境修筑防御工事,沉重的劳役负担使得叙利亚人民苦不堪言。据时任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回忆:“(易卜拉欣)帕夏从来不认为他的北部边境是安全的,我至今还没有发现在叙利亚北部地区有哪一座重要的城镇没有埃及人建造的兵营。”^③

易卜拉欣这些不当的军事策略最终引发了叙利亚人民的反抗斗争。从1834年颁布征兵令后,耶路撒冷、纳布卢斯、希伯伦和雅法等城市先后爆发了人民起义。1834年7月,巴勒斯坦地区的起义军控制了除阿卡以外的所有地区,穆罕默德·阿里大为震惊,亲自出兵巴勒斯坦,才平息了这次叛乱。伴随着1837年解除人民武装法令的出台,黎巴嫩东部山区和豪兰地区的德鲁兹农民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抗斗争,他们凭借山区险峻的地形,

① Yvette Talhamy, “The Nusayri and Druze Minorities in Syri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Revolt against the Egyptian Occupation as a Case Study,” i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Nov. 2012.

② James Augustus, *Egypt and Mohammed Ali*, London, 1834, p. 234.

③ Asad Jibrail Rustum, “Syria under Mehemet Ali,”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t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Oct. 1924.

击退了埃及军队的数次进攻。易卜拉欣被逼无奈，只得将反抗者围困山区，断水断粮，乃至水中投毒，才平息了这次叛乱。^①此后，叙利亚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接连不断，直到埃及军队最终撤出叙利亚。这些农民起义给易卜拉欣在叙利亚后期的统治带来很大麻烦，动荡的国内环境也使许多政治经济政策没能付诸实践。

（二）埃及在叙利亚地区的统治特点及评价

1. 埃及在叙利亚统治的特点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埃及在统治叙利亚期间采取了许多有别奥斯曼帝国的新策略和新政策，无论其最终效果如何，都使得其统治表现出独特的一面。从整体上看，埃及在叙利亚的十年统治有着三个突出的特点：叙利亚经济附庸化、宗教氛围宽松化、社会环境西方化。

首先，埃及在叙利亚地区统治的最大特点是叙利亚经济逐渐走向附庸。穆罕默德·阿里家族从阶级属性来看属于埃及的新兴地主阶级，由于阶级的局限，埃及占领叙利亚的出发点并不是要将叙利亚发展成物阜民丰的现代化国家，而是要通过中央集权，最大程度控制和掠夺叙利亚。在埃及统治叙利亚期间，穆罕默德·阿里更多的是将其视作埃及的附庸而非自己领地的一部分，他命令易卜拉欣尽其所能在叙利亚扩充军队，叙利亚的青壮年一时成为埃及军队的主要来源。据统计，1837年，埃及军队的总人数为123225，其中叙利亚地区的军队就达到了67957，^②超过了总人数的一半。此外，易卜拉欣还依照埃及的模式，对叙利亚的丝绸、羊毛和亚麻产业以及木材、煤炭等战略资源进行国家垄断。埃及在统治叙利亚的十年，从叙利亚向外运输木材和煤炭的活动从未间断，易卜拉欣还特意修建了数十条连通森林、矿区和港口的道路，以便于资源的运输。^③就这样，易卜拉欣把叙利亚逐渐改造成埃及的原料产地和财富来源地，叙利亚经济切切实实沦为了埃及的附庸。

① Yvette Talhamy, "The Nusayri and Druze Minorities in Syri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Revolt against the Egyptian Occupation as a Case Study," i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Nov. 2012.

② Haddad Yazbeck, *The Administrative and Economic Policies of Ibrahim Pasha in Palestine, 1831 - 1840*.

③ M. W. Dal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37.

其次,埃及统治叙利亚期间叙利亚的宗教氛围较之前明显宽松化。这与易卜拉欣所倡导的“阿拉伯复兴”思想息息相关,他曾多次在公众场合表示“阿拉伯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阿拉伯人有穆斯林也有基督徒,所有教派的人要团结起来,共同复兴阿拉伯文化。”^①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易卜拉欣极力主张教派平等,通过各项政治经济手段提高基督徒和犹太教徒的社会地位。通过他的努力,部分叙利亚人民对民族的认同逐渐超越了宗教的分歧,叙利亚的宗教关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基督徒和穆斯林第一次在叙利亚携起手来。

最后,埃及对叙利亚的十年统治带有明显的西方化色彩。如前所述,易卜拉欣在叙利亚的统治模式是效仿他父亲的,他在叙利亚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可以说是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在地域上的延伸。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因而,易卜拉欣在叙利亚的统治也必然被刻上了西方化的烙印。埃及统治叙利亚时期可谓是叙利亚历史上第一次将目光投向西方,易卜拉欣敞开国门接受欧洲的新事物和新思想,由于法国与埃及的特殊关系,大批叙利亚学生被派到法国留学,法国的专家也被派往叙利亚帮助管理国家和训练军队。法国由此逐渐在叙利亚地区占得了先机,以致在一战结束后叙利亚被划归法国进行委任统治。叙利亚在这一时期西方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同西方国家的经贸往来大幅度增加,易卜拉欣先后与法、英、俄等国签订了有关商业贸易方面的相关条例,为叙利亚的国际贸易创造了自由的环境,叙利亚由此进入世界贸易市场。在埃及统治叙利亚期间,叙利亚平均每年的对外贸易额都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的2~3倍,贝鲁特一时成为联结欧洲和叙利亚地区的国际商贸港。^②与此同时,欧洲人被允许自由出入叙利亚的各大城市,一时间叙利亚的欧洲人数量大规模增加,他们把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传入叙利亚,叙利亚人民第一次对西方世界有了如此近距离的认识,叙利亚也因此成为阿拉伯世界中较早接触西方文化的地区。

2. 埃及在叙利亚统治的评价

从前文的论述中我们知道易卜拉欣是位思想开放、富有远见的政治家,

^① W. Polk, *The Opening of South Lebanon, 1788-184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132.

^② Asad Jibrail Rustum, "Syria under Mehemet Ali,"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t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Oct. 1924.

他在叙利亚效仿其父进行了一系列西方化改革，对宗教实行宽容政策，倡导阿拉伯复兴，使叙利亚地区在现代化之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但单就埃及在叙利亚十年统治的具体成效来说，易卜拉欣是失败的。由于埃及统治者从一开始就把叙利亚定位为掠夺的对象，这注定了他们不会切切实实为叙利亚人民办事，易卜拉欣在统治叙利亚的十年也从未颁布过一条有关改善人民生活福利的政策法令。叙利亚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不断起义和反抗斗争表明埃及的统治者在叙利亚是不受欢迎的。

可以肯定地说易卜拉欣在叙利亚进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出发点是正确的，但败在了民心上。“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易卜拉欣在叙利亚后期的统治举步维艰，他在经济方面采取的一切新举措都被当地人民怀疑是埃及统治者剥削、掠夺叙利亚经济的新伎俩，对军事方面的一切改进都被视作强制征兵的新手段。因此，叙利亚人民从骨子里对埃及统治者是不信任的，作为以穆斯林为主体的阿拉伯国家，他们认为伊斯坦布尔的哈里发才是他们理应服从的对象，而身为阿尔巴尼亚人出身的穆罕默德·阿里家族在叙利亚的统治不具备合法性。更为重要的是，埃及统治者缺乏对叙利亚社会传统组织模式的深刻认识，由此做出许多错误的判断。拿巴勒斯坦地区来说，这里历史上一直被割据一方的封建领主和大家族势力所控制，历来政府对他们都无可奈何，奥斯曼帝国对他们的统治政策也是“只要他们服从帝国中央和地方政府，政府就让他们存在下去。”^①而埃及统治者却不这样认为，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管理和控制，易卜拉欣将巴勒斯坦地区有势力的领主和族长悉数驱逐流放，解散部落组织，划归地方政府统一管辖。但巴勒斯坦的家族制不同于埃及的马木鲁克，埃及统治者在驱散马木鲁克势力后赢得了民心、增强了中央集权，但巴勒斯坦人民对家族族长有着十足的崇敬感和认同感，易卜拉欣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让巴勒斯坦人民感到欢欣鼓舞反而招致了人民的恐惧与憎恨。

另一方面，易卜拉欣对叙利亚基层人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缺乏足够的认识，他始终致力于在叙利亚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政府和自由市场体系，但却不知这在整个社会大环境还十分传统的叙利亚并不现实，是过于超前

^① 纳忠 《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1999，第375页。

的举措。从农民到手工业者再到宗教人士,叙利亚人民对自己生活圈子之外的事情并不感兴趣,他们只专注于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生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生活的村镇,抱着强烈的宿命观,拒绝接受新事务和新思想。因此,易卜拉欣一些美好的设想在叙利亚注定也只能成为设想。

总体说来,叙利亚地区民族众多、宗教复杂、地方割据势力强大、家族制盛行、游牧一半游牧民族长期存在,这些因素都使叙利亚较埃及而言更难管理和统治,叙利亚人民也较埃及人民更难“驯服”。在埃及统治叙利亚后期,叙利亚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群众反抗埃及统治者的起义不断,人民内部也是相互倾轧。黎巴嫩德鲁兹派与基督徒冲突不断,萨法德人民和拉塔基亚人民相互倾轧,库尔德人和贝都因人残杀巴勒斯坦人等,现代黎巴嫩国家马龙派和德鲁兹派的常年冲突埋下了祸根。总之埃及统治叙利亚期间,整个叙利亚地区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加之易卜拉欣没有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使得埃及统治叙利亚期间并没有取得太多实质性的成效,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段历史在叙利亚近代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埃及在叙利亚的十年统治极大地推动了叙利亚地区的现代化进程。

(三) 埃及在叙利亚地区统治的终结

1. 第二次土埃战争

1833年,土埃双方签订的《屈塔希亚和约》本身就是西方列强干涉的产物,它没有满足任何一方的要求,反而造成土埃矛盾进一步尖锐。奥斯曼帝国因此条约丧失了大面积领土,伺机报复;而埃及虽然占领了叙利亚,但并没有完全脱离奥斯曼帝国而独立,更没有达到穆罕默德·阿里建立一个大阿拉伯帝国的目标。因此,和约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而是酝酿着下一场战争的开始。1833年7月,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签订了《温卡尔—伊斯凯莱西条约》,规定一方遭到外来入侵或内部发生叛乱时,另一方将给予军事援助。该条约是在第一次土埃战争刚刚结束三个月后签订的,可见奥斯曼帝国的出发点就是针对埃及。而埃及也在想办法回击,易卜拉欣之所以疯狂在叙利亚进行征兵和修筑军事工事,目的就是为了防备奥斯曼帝国的进犯。可见,土埃两国时刻准备着,迎接随时到来的战争。

1839年4月,穆罕默德·阿里在法国的怂恿下宣布独立,停止向苏丹

马哈茂德二世纳贡，而奥斯曼帝国则在时任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Palmerston）的唆使下，调集军队，于 1839 年 4 月 21 日渡过幼发拉底河进攻叙利亚，第二次土埃战争爆发。战争开始后，人数上占优的奥斯曼帝国军队相比第一次土埃战争并没有什么进步，被易卜拉欣率领的埃军仅用一天的时间就驱逐出了叙利亚。24 日，土埃双方在叙土边境的纳齐卜（Nezib）进行决战，战斗开始后，奥斯曼军队全线崩溃，约有 4000 人战死，1.5 万余人被俘，还丢失了大批枪支弹药。^① 经过这次战役，奥斯曼军队的大部分主力已被歼灭，战争的结局已经非常明朗。埃军一路高歌猛进，再一次踏进了安纳托利亚，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司令率领 25 艘战舰和 2 万多名水兵投降埃及，奥斯曼帝国危在旦夕。同日，苏丹马哈茂德二世病逝，他的儿子，年仅 16 岁的麦吉德（Abdul Mejid）继位，小苏丹已经做好向埃及屈服的准备，命奥斯曼军队停止前进，派使节前往埃及求和。^② 值此千钧一发之际，英国照会奥斯曼帝国政府：未经英国允许，不得单独决定埃及问题。^③ 列强的干预使战争局势发生了彻底的转变，支持土耳其的英国、支持埃及的法国与一心想单独控制土耳其的俄国各怀鬼胎、相互竞争、相互妥协，土埃之间的战争再一次成为列强讨价还价的砝码。

2. 大国干涉与《伦敦协定》

不同于第一次土埃战争时期列强的角色缺失，特别是英国忙于处理欧洲人民大革命而无暇东顾，第二次土埃战争从一开始列强就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穆罕默德·阿里是在得到法国政府许可的前提下宣布独立的，而奥斯曼帝国则是在战争开始半年前与英国政府签订了新的商约，奥斯曼帝国企图讨好英国以博得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使英国支持自己。再往前看，奥斯曼帝国甚至在 1833 年就与俄国签订了军事互助条约。因此，这场战争注定不只是土埃两个国家的战斗，英法俄等西方列强绝不会坐视不理。

在英、法、俄三大列强中，法国向来是埃及的支持者，而俄国则是打着保护苏丹的旗号一心想单独控制奥斯曼，因此，英国的态度在这次争端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埃及统治者在叙利亚实行的保护性贸易政策和垄断性经济政策严重损害了英国的商业利益，更重要的是，一向奉行“均势

① 杨灏城 《埃及近代史》，第 103 页。

② 彭树智 《中东史》，第 178 页。

③ 杨灏城 《埃及近代史》，第 104 页。

外交”的英国不会容忍强大的埃及取代衰落的奥斯曼帝国，从而打破现有的欧洲政治格局。因此，英国政府向法、俄、普、奥四国提议：共同维护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穆罕默德·阿里退出叙利亚，授予其世袭埃及的权力。^① 法国政府立即表示反对，坚持把整个叙利亚划归埃及管辖。列强的意见产生了严重分歧，而另一边奥斯曼帝国危在旦夕。英国政府决定将法国撇在一边，同俄、奥、普三国于1840年7月15日在伦敦签署了“关于解决黎凡特问题的有关协议”，即《伦敦协定》。协定规定：四国联合保证奥斯曼帝国的主权和独立，穆罕默德·阿里从叙利亚撤军，给予其对埃及的终身管辖权，倘若在二十日内没有收到回复，四国将联合起来对其诉诸武力。^②

穆罕默德·阿里相信法国会在关键时刻对其予以援助，因此他对列强的这一协定视而不见，下令加固城防，积极备战。1840年8月11日，英、俄、普、奥四国对埃及宣战，由1500名英国士兵和5500名奥斯曼帝国士兵组成的联军在贝鲁特登陆，很快占领了黎巴嫩沿海城市，并煽动叙利亚人民起来反对埃及的统治。^③ 埃及军队被迫撤离叙利亚沿海城镇，退守内陆，并向法国求援。但法国政府此时已意识到英、俄等国心意已决，因此不愿冒着与西方列强进行一场欧洲大战的风险来保护穆罕默德·阿里，他敦促埃及做出让步，与奥斯曼帝国进行谈判。外部大军压境、内部人民起义不断，加之法国在关键时刻背信弃义，穆罕默德·阿里陷入绝境，他被迫向英国屈服，答应接受《伦敦协定》条款，撤回全部军队。易卜拉欣于1841年2月率7万叙利亚军队取道加沙返回埃及，埃及在叙利亚的十年统治至此终结。

三 19世纪30年代埃及在叙利亚统治的影响

19世纪30年代，埃及对叙利亚的占领和统治从时间上看虽不是很长，但它却是地区意义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之所以这么说，不仅是因为它敲开了叙利亚西方化和现代化的大门，更重要的是它构成了国际社会发展变化的一部分，它对“东方问题”的发展演变以及中东地区的历史走向都产生

① Asad Jibrail Rustum, "Syria under Mehemet Ali,"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t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Oct. 1924.

② 杨灏城 《埃及近代史》，第104页。

③ 杨灏城 《埃及近代史》，第105页。

了深刻的影响。埃及对叙利亚十年的统治，给叙利亚社会带来了重大的变化，翻开了叙利亚历史崭新的一页，叙利亚地区由此开启了现代化进程。而作为穆罕默德·阿里统治埃及期间“最大的军事冒险”，第二次土埃战争对埃及来说则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强大的埃及从此一蹶不振，并逐步走上了半殖民地道路。奥斯曼帝国作为欧洲的“稳定剂”，在经过两次土埃战争的惨败之后，清醒地认识到国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此帝国开启了被称之为“坦齐马特”（Tanzimat）的著名近代化改革。而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埃及在叙利亚的统治使原本就错综复杂的“东方问题”进一步激化，英法俄等西方大国对奥斯曼帝国的争夺达到白热化状态，从而逐步走向了新的国际战争——克里米亚战争。而埃及统治者易卜拉欣在叙利亚所宣扬的“阿拉伯复兴”和“阿拉伯民族团结”思想也逐步深入一批叙利亚人民心中，人民对阿拉伯民族的概念有了新的认识和感悟，这对 19 世纪中叶叙利亚率先产生“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及日后民族国家的构建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一）对叙利亚、埃及以及奥斯曼帝国的影响

1. 叙利亚社会开始向现代化迈进

在埃及统治叙利亚期间，易卜拉欣将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的西方化改革移植到叙利亚，并用自己开放的理念对整个叙利亚地区进行治理和改造，虽说其出发点是为了埃及的利益，但其所作所为却使得叙利亚发生了数百年来前所未有的变化。

自 1516 年奥斯曼帝国将叙利亚纳入版图，三百多年来，叙利亚社会并没有发生太多的改变，中央集权衰微、地方割据严重、经济发展滞后、教派纷争不断、人民的思想传统而保守，可以说奥斯曼帝国对推进叙利亚历史的发展并没有做出很大的贡献。正当奥斯曼帝国日益衰落之际，欧洲各国的工业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悲哀的是叙利亚的人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同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一样他们将自己视作“天朝上国”，把欧洲人视作劣等民族。从这一点上讲，埃及统治者对叙利亚做出的最大贡献应当是对人民思想的启蒙。易卜拉欣将叙利亚人民的目光第一次聚焦到西方，在开放的政策下，大批欧洲人进入到叙利亚，这让叙利亚人民开始认识西方、了解西方，进而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的位置，这对叙利亚今后的发展是至

关重要的。“民智开而国家强”，如同中国在认识到自己的差距之后进行的一系列变法维新运动，叙利亚也正是从这之后开启了学习西方的热潮，涌现出一大批思想家和政治家，并最终成为中东地区的文化中心和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的发祥地。

埃及在统治叙利亚短短的十年，做了很多奥斯曼帝国从未进行过的改革尝试。政治上，埃及统治者在叙利亚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制度，虽说目的是为了将整个叙利亚纳入其直接管控，但这毕竟结束了叙利亚数个世纪以来分散、无序的地方分权体制。中央集权制度对叙利亚的发展至关重要，很难想象一个封建势力割据、家族统治盛行、社会秩序杂乱无章的地区如何走向现代化。经济上，叙利亚这十年最大的两个变化，一是可耕地面积增加了，二是国际贸易大幅度提升了。可耕地的增加一方面使得粮食产量有所提高，另一方面使更多的游牧一半游牧民开始定居生活。粮仓日益丰实，社会秩序趋于稳定，这是一个国家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基石和保障。与此同时，得益于埃及统治者开放的经济政策，叙利亚地区开始融入世界贸易体系，而这正是每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文化上，埃及统治者平等开放的宗教政策从本质上看也是“启民智”的一部分，他试图让叙利亚人民的民族情结战胜宗教分歧，让所有阿拉伯人不分区域不分教派团结协作共同振兴阿拉伯民族。这可以说是叙利亚地区乃至整个阿拉伯国家开启现代化进程的精神动力。

因此，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角度看，埃及在叙利亚的十年统治都为叙利亚的现代化进程打好了基础，使得叙利亚社会开始向现代化迈进。

2. 埃及由盛转衰与奥斯曼帝国开启近代化改革

穆罕默德·阿里在征服叙利亚之前已先后发动和参与了半岛战争、苏丹战争和希腊战争，他一心要建立起一个以埃及为中心的阿拉伯帝国。但在第二次土埃战争之后，他的“帝国梦”彻底覆灭，不仅如此，埃及的强国之路也就此走到尽头，并最终走上了半殖民地道路。

在第二次土埃战争之后，奥斯曼帝国苏丹颁布了一条敕令：埃及军队在和平时期不得超过1.8万人，未经苏丹许可不得建造战舰。^①这一敕令对穆罕默德·阿里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埃及当时的军队有12.3万余人，

^① 杨灏城 《埃及近代史》，第107页。

这意味着他要裁军 10 万余人，这相当于彻底摧毁了埃及的军事力量。没了这支能征善战的军队，埃及再也没有实力与奥斯曼帝国抗衡，也无法抵挡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了。如前所述，埃及的经济大部分是为军事服务的，军工厂在埃及的工业领域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因此大量裁军使得以军事工业为支撑的埃及经济失去了发展的原动力。

让埃及更为被动的是，第二次土埃战争的失利意味着此前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列强所签署的各项商约、协定也将在埃及生效。列强强迫穆罕默德·阿里降低关税，废除政府专卖制度。此后，埃及的大门被打开，洋货充斥着埃及市场，本地工厂纷纷倒闭。^①同时，埃及的专卖权被取消后，政府无法像之前那样对产品进行垄断，发展官办工业，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也就失去了所需的资金支持。因此，第二次土埃战争的失败不仅意味着埃及失去了叙利亚，也宣告了穆罕默德·阿里改革的终结。这一系列事件使穆罕默德·阿里在精神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 1849 年与易卜拉欣相继离世，埃及的统治权交给了他的孙子阿巴斯一世（Abbas I），埃及由此走上了半殖民地化道路。

同样地，埃及入侵叙利亚这一历史事件对另一主角奥斯曼帝国也产生了非常大的震动，虽然在西方列强的干涉下自身领土得到保全，但战争的惨败充分暴露了帝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软弱无力，这使得奥斯曼帝国的一批有识之士深刻地认识到国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前所述，马哈茂德二世在第二次土埃战争期间离世，新继任的小苏丹年仅 16 岁，因此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权落到了改革派的代表人物时任大维齐尔兼外交大臣的穆斯塔法·赖希德（Mustafa Resit）手里。他于 1839 年 11 月 3 日以苏丹名义公布了《御园敕令》（亦称《花厅御诏》），奥斯曼帝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坦齐马特”运动至此开始。

首先，从《御园敕令》颁布的时间点来看，1839 年 11 月第二次土埃战争尚未结束，此时，奥斯曼帝国败局已定，欧洲列强正在为如何解决埃及问题而争论不休。由此可见，对埃战争的失利是开启“坦齐马特”运动最直接的推动因素。其次，从《御园敕令》最初的内容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苏丹臣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废除包税

^① 陈天社 《埃及近代的殖民地化及其原因》，《阿拉伯世界研究》1996 年第 2 期。

制,实行直接征税制;采用征兵制,明确限定服役期限;所有宗教一律平等,什一税改由政府统一征收。^①不难发现,这四项改革的基本内容易卜拉欣在统治叙利亚期间都悉数实行过,至少都正式提出过。可见,奥斯曼帝国的近代化改革或多或少的从埃及在叙利亚的统治中借鉴了经验。在此后奥斯曼帝国的各项改革措施中,都可以找到埃及在叙利亚统治的影子,1869年奥斯曼帝国引进了世俗法律并建立了世俗法庭,与早已存在的沙里亚和伊斯兰法院形成了宗教世俗二元化的法律体系。这与前文所介绍的易卜拉欣在叙利亚所创办的议会法庭如出一辙。由此可见,埃及对叙利亚的入侵和统治是奥斯曼帝国开启近代化改革的直接推动力,同时,也为它的改革提供了一个范本和参照物。

(二)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及东方问题的复杂化

1. 促进了以叙利亚为中心的早期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的诞生

早期阿拉伯民族主义是由阿拉伯基督徒发起,表现为以古典语言文学研究、印刷出版业、教育事业和翻译运动为内容的文化复兴运动,其长远目标在于争取阿拉伯人在奥斯曼帝国的自治。^②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潮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甚至更早。叙利亚地区作为这一思想运动的发源地,有着众多历史原因,其中19世纪30年代埃及对叙利亚为期十年的西方化统治便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阿拉伯民族主义应归属于思想文化范畴,因此,从总体上看,埃及统治者所秉持的开放性统治理念,使叙利亚人民的思想受到了启蒙,传统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改变,因而“民智开化”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在此诞生敞开了大门,这可以说是埃及统治者为此做出的根本性贡献。具体说来,埃及在叙利亚的统治在两个方面对早期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诞生起到了推动作用。

首先,埃及的统治者易卜拉欣自身就可称为早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因此他在叙利亚的所作所为必定会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易卜拉欣在统治叙利亚期间积极倡导阿拉伯民族团结和复兴,他主张凡是讲阿拉伯语的人都是同一个民族,阿拉伯人民不分教派、不分区

^① A. F. Khater, *Sourc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Boston, 2004, p. 13.

^② 黄民兴《中东历史与现状十八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第87页。

域一律平等，他在统治叙利亚的十年始终致力唤起叙利亚人民对民族身份的认同感。据一位曾拜访过易卜拉欣的法国特使巴斯拉回忆：“（易卜拉欣）帕夏毫不掩饰他关于复兴阿拉伯民族意识和建立一个所有人民都充满爱国思想和团结力量的阿拉伯国家的意图。他在演讲中，多次向他的军队和臣民提到阿拉伯历史上的辉煌时期，用他自己的热情感染他们。”^① 在对易卜拉欣统治叙利亚时期所倡导的思想和实施的政策进行简单认识和了解后就不难发现，他的思想与 19 世纪后期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一些主流思想是非常相似的，包括“阿拉伯民族主义精神之父”萨提·胡斯里的主张。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受到了易卜拉欣思想言论的启发和激励，也是从那时起，他们才开始真正考虑阿拉伯民族的意义和价值。

其次，得益于埃及统治者开放的统治理念，大批西方传教士在此期间来到了叙利亚，而比此更有意义的是，他们的到来伴随着大批世俗学校的创建，学校的建立促进了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使得西方的教育、思想、文化、价值观得以在叙利亚进行全方位的渗透。在传教士的影响下，叙利亚的知识界特别是黎巴嫩的基督徒开始纷纷兴办学校、创办报刊、建立印刷厂、开展各种学术活动等，他们在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的影响下，宣传复兴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学，提倡研究阿拉伯历史和文化。^② 经过这些活动，叙利亚人民的民族意识日益清晰，早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就此在叙利亚萌芽。正如费希尔所说“埃及占领叙利亚期间迸发出的民族主义火星，在易卜拉欣撤出之后，使得贝鲁特和大马士革成为刚刚兴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中心。”^③ 叙利亚也因此被称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跳动的的心脏”。

2. “东方问题”趋于复杂化

埃及和叙利亚作为奥斯曼帝国最为重要的两个属地，19 世纪 30 年代埃及对叙利亚的占领和统治势必对列强在东地中海的利益产生巨大冲击，因此以英法俄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列强相继卷入，致使原本就错综复杂的“东方问题”进一步激化，列强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深，最终走向了一场欧洲大战。

^① M. W. Dal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85.

^② 王新刚《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商务印书馆，2003，第 143 页。

^③ （美）西·内·费希尔《中东史》，第 451 页。

俄国应该说是奥斯曼帝国最大的对手,它在历史上先后同奥斯曼帝国进行了大小十余次战争,其中在埃及统治叙利亚之前有八次,奥斯曼帝国在近代的不断衰落与俄国的频繁骚扰和挑战有着直接的关系。此前俄国已通过战争威胁和外交施压同奥斯曼帝国先后签订了《库楚克—开纳吉条约》(1774)、《阿克尔曼条约》(1826)和《亚得里亚堡条约》(1829),从奥斯曼帝国攫取了大量的政治经济特权,俄国最终目的是要独自控制这一衰落的帝国。

英法两国对俄国的意图非常清楚,也对它在奥斯曼帝国的一举一动非常警惕。俄国势力在奥斯曼帝国的不断扩张必然对英法两国的利益和东方商路的安全造成威胁,因此,从一致对俄国的角度来看,英法两国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都极力维持一个独立完整的奥斯曼帝国,以抵制俄国的南下扩张。但在对待埃及的态度上,英法两国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法国是埃及的坚定支持者,而英国则对它的扩张持反对态度。由此可见,英法俄三国在东方问题上矛盾重重,利益冲突不断,关系十分紧张。就在此刻,穆罕默德·阿里出兵占领了叙利亚,令本已非常紧张的东方局势骤然升温。

埃及占领叙利亚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1833年奥斯曼帝国同俄国签订了《温卡尔—伊斯凯莱西条约》,双方建立了军事同盟关系。同时,条约的秘密条款规定:奥斯曼帝国履行根据俄国的要求封闭达达尼尔海峡的义务。^①这一秘密条款被曝光后,英法两国大为震惊,立即表示强烈反对,并派出舰队在奥斯曼帝国沿海进行军事示威,英法两国与俄国之间的矛盾由此加深。此后,在1838年,奥斯曼帝国为了获得英国在未来与埃及战争中对它的支持,与英国签署了《英土商业条约》,随后,法、俄、奥等国均要求与英国享有同等的待遇,奥斯曼帝国进一步沦为西方列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的经济争夺也日趋激烈。

在这一背景下,埃及同奥斯曼帝国于1839年进行了第二次战争,列强在东方问题上的争端再一次达到高潮。最终,英国抛开法国同俄、奥、普三国签署了《伦敦协定》,达成了解决土埃问题的一致意见,自此之后,法国在埃及的影响力大幅下降,它在埃及的种种优势也逐渐丧失,取而代之

^① Haddad Yazbeck, *The Administrative and Economic Policies of Ibrahim Pasha in Palestine, 1831 - 1840.*

的是用武力迫使埃及做出让步的大英帝国，以致后来埃及逐渐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埃及的问题一经解决，海峡问题便被提上日程。1841 年 7 月英、法、俄、奥、普五国和奥斯曼帝国签订了关于各国军舰封闭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公约，简称《伦敦海峡公约》，条约宣布 1833 年俄土《温卡尔—伊斯凯莱西条约》无效，海峡处于欧洲列强的共同监督之下。^① 俄国至此丧失了在海峡的所有特权，英国取得了在奥斯曼帝国的战略优势。由此可见，列强围绕埃及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问题进行了非常激烈的争夺，他们从各自利益出发，相互遏制又相互利用，把奥斯曼帝国完美地演绎成了自己的竞技场。

随着埃及对叙利亚统治的终结，东方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解决。法国不会坐视如此轻易失去在埃及的优势，于是在叙利亚地区与英国展开了更加激烈的争斗。而俄国更不甘愿失去对海峡的控制，因而绝不会去履行《伦敦海峡公约》的规定。错综复杂的东方问题最终使互不服输的列强走向了 19 世纪 50 年代的国际战争。

结 语

埃及通过西奈半岛与叙利亚地区相接，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因素，二者在历史上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人类文明诞生之后，二者的交流（或和平或战争）就从未间断，埃及早在新王国时期就不断通过对外战争与赫梯人争夺叙利亚。因此叙利亚和埃及注定成为难舍难分的一对组合，以致“所有占有埃及的强国也渴望获得叙利亚，这在历史上已不是第一次”。^② 伴随着 19 世纪初穆罕默德·阿里西方化改革的推行，埃及成为“奥斯曼帝国唯一有生命力的部分”。^③ 延续了历史的规律，穆罕默德·阿里也将目光投向了叙利亚，并通过战争将叙利亚收入囊中。

受穆罕默德·阿里的影响，埃及的统治者易卜拉欣在叙利亚实行了开放的统治政策，并把埃及的改革推行至叙利亚。一方面，在埃及统治叙利

① 彭树智《中东史》，第 179 页。

② C. W. Crowley,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The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99, p. 995.

③ 彭树智《阿拉伯国家史》，第 182 页。

亚期间，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叙利亚的封建割据势力和地方分权体制被摧毁；国家建立起了对商品贸易的垄断，叙利亚的经济得到了初步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埃及统治者敞开国门接受欧洲的新事物和新思想，叙利亚人民的思想受到了启蒙，西方的政治文化和思想观念开始在叙利亚渗透；此外，易卜拉欣倡导的阿拉伯复兴与宗教平等观念也为阿拉伯民族的团结和国家凝聚力的增强贡献了一分力量。另一方面，埃及对叙利亚的入侵使得欧洲列强在这一区域的争夺斗争“愈演愈烈”，从而影响了整个 19 世纪后半期欧洲的政治局势。

[责任编辑: 申玉辉]

Sino-Israel Cooperation on Water Technology

Zhang Bo

Abstract: Sino-Israel water technology cooperation is one of the highlights of Sino-Israel Cooperation. Israel has advanced water technology. Manufacture industry is developed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water contaminatio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tasks are heavy in Guangdong. In May 2012, Guangdong Sino-Israel Water Treatment Innovative Industrial Park Co., Ltd. began to construct the Sino-Israel Industrial Park for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dong province is famous for its agriculture sector, but its water shortage is serious. In November 2014, Shouguang city of Shandong was formally chosen as the model city for Israel water technology. Israel is actively spreading the integration of water and fertilizer, and water 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in Shandong. Northwest China is arid and semi-arid region. Israel strongly supports northwest China in the form of water technology and funding. Netafim Company set up a drip irrigation equipment plant in Yinchuan, Ningxia. China should not only learn Israel's water technology, but also its ideas of water conservation, innovation spirit, etc; Sino-Israel water technology cooperation is beneficial to the balance of Sino-Israel trade relations; China should protect the patent and intellectual rights of Israel technologies.

Keywords: China, Israel, Water Technology Cooperation

A Study of Egypt's Rule in Syria in the 1830's

Liu Yuan Wang Xingang

Abstract: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Egypt became the "only living part in the Ottoman empire" after westernization reform of Muhammad Ali. With the declining of Ottoman empire, Egypt basically in a state of relative independence and gradually towards the expansion. Muhammad Ali's western-style reform, mean-

while , also with its expansion drive extends to other regions. Syria i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among them. After the first Ottoman-Egypt war , the Treaty of Kutahia was signed , and Egypt's has ruled Syria. In this decade , Syria had set up a centralized political system; social economy developed. The western political culture spread in Syria. The Egypt's ruling created a new era of Syrian history. Syrian began to modernization.

Keywords: Egypt , Syria , Muhammad Ali , Ibrahim , Ottoman Empire

A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of the Nitocris Adoption Stela

Ma Yizhou

Abstract: The Nitocris Adoption Stela was a very important stela in the period of Psammtik I in the 26th Dynasty. This stela recorded the King Psammtik I sent his daughter to the temple of Amun , became the successor of Adoratrix of Amun. By this way , Psammtik I controlled the priests of the temple of Amun , more important , he reunited Upper and Lower Egypt. So it is necessary to translate the text into Chinese with commentary , and it is useful to study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26th Dynasty.

Keywords: Ancient Egypt , Psammtik I , The Nitocris , Adoption Stela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Soviet Union's Policy on Central Asian Islam

Shao Liying

Abstract: After October Revolution , Muslim's attitude on The Soviet Union changed from expectation to despair. Some of them attend the Basmachi Movement , and others became progressives. The former was suppressed; the latter's religious activity was stopped , owing to its great influence and non-cooperation for